

用生命种子传递中国人民的友情

报告人:潘克勤



我叫潘克勤,是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应邀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在首尔大学他发表演讲,讲到了我国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为韩国患者捐献干细胞的故事。

迄今为止,我国志愿者已经通过红十字会,成功为韩国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45例。非常幸运,我就是这45位跨国捐献者中的一员,曾经两度为韩国患者捐献出生命的种子。

我是浙江省听力语言康复中心一名普通的言语康复老师,为0—6岁的听障儿童提供听言语康复训练。我所带的班级有16名孩子,因

为种种原因,他们只能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交谈、欢笑。但在我的眼里,他们和其他孩子一样活泼、可爱。看着孩子们一天天康复、一天天成长,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也由衷地为孩子们感到骄傲。在工作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关爱他人、扶助弱者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

平静的生活,在2012年2月22日,被一个意外的电话打断了。

打来电话的是江干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说,我的血样与一名韩国白血病患者配对成功,希望我能为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说实话,那一刻,我有过一丝犹豫。

捐献造血干细胞,在当时并不多

见,社会上有许多不理解,觉得捐献造血干细胞会危害身体健康,甚至影响生育。

我还担心捐献可能会耽误班上孩子们的康复训练。因为是涉外捐献,采集工作必须在北京进行,前后需要离开一段时间。而我带的这些孩子们又很特殊,常人简单的一个发音,他们要做许多遍才可能掌握。我的离开,就意味着好不容易取得的进步,很可能退回原地,甚至变得更糟。

但是,作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我更清楚地知道,治愈白血病的唯一办法就是移植造血干细胞。在非亲缘人群中,造血干细胞成功配型的几率是几万乃至几十万分之一,而跨国成功配型的几率更低。



能在一生中碰上这种小概率事件,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救人的机会摆在面前,我岂能临阵退缩。

在省残联领导和单位同事们的支持和鼓励下,我拨通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

起初我还把这个事情瞒着父母。出发前夕,省残联领导亲自给他们打了电话。父亲一开始强烈反对,而母亲也是心有疑虑。他们担心,我还年轻,还没有结婚,这样的捐献会不会影响到我以后的身体健康,甚至生育?经过我的反复解释,当他们了解到如果不捐就意味着一个生命将会离去时,他们最终选择了支持。

2012年6月底,我到达北京空军总医院。打了4天的动员剂后,7月2号至3号,经过了共6小时的两次采集,我成功捐献了272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远隔千里之外的韩国白血病患者,有了生的希望。

捐献过程中,我无数次想象过韩国患者的情况,想象他长什么样

子呢?会不会像韩剧里,是一个“长腿欧巴”嘞?但当捐献结束后,我的内心却出奇的平静。当晚,我在博客上写下了一段话“但愿我可以帮到你,虽然我们相隔几千里,衷心期望你能恢复健康。”

捐献结束后,我回到杭州,生活重新恢复平静。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除了正常上下班,我还被爱神眷顾,收获了爱情。

原本以为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了。但是,2013年2月,就在我即将举行婚礼的前一周,一个熟悉的电话号码让我的心再一次掀起。原来,韩国患者的病情出现了反复,唯一的希望就是再次捐献。

当时,电话的另一头,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也非常矛盾。一方面韩国患者的病情危在旦夕,另一方面他们也吃不准我是否会同意再次捐献?

这一次和上一次不同,“要不要告诉我的另一半”成了我的心病。“我该怎么跟他说呢?”“他会同意

做天使的守护者

报告人:曹燕芳

我叫曹燕芳,很荣幸今天能够代表全省50多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站在这里,让大家了解器官捐献、了解协调员。

这50多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来自全省各地、各个单位,他们有的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有的是医务工作者,甚至还有社会志愿者,但是在器官捐献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在捐献者和移植等待者之间,架起一座生命的桥梁。很荣幸,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是2010年转岗成为全省首位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做这一行已经5年了。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选择做一名协调员?我曾经是一名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亲眼见过许许多多因罹患各种疾病离开这个世界的人。记得有一位患者,因为肝硬化,没能等到肝移植就离去了。那一天,他的妻子和读大学的儿子默默地为他穿着衣服,没有大声的哭泣。我听到他的妻子对他说:“你把我从新疆带到了杭州,说了会好好照顾我的,可是你现在却走了”。这个场景、这一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无法抹去。我想如果有可能,她的家庭是可以完整的,这就是器官移植的意义。

很多人问我,协调员到底是做什么的?5年前的现在,我面对最多的是被拒绝。那个时候绝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器官捐献,甚至包括成为协调员之前的我自己。

2010年的春天,我省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才刚刚开始。我接到一家县级医院打来的电话,有位男性患者,40多岁,因为从工地高处坠落,已经脑死亡了,他的小舅子问医生角膜捐献该怎么弄。接到这个消息后,我想他们在考虑角膜捐献,是否也会考虑器官捐献呢?我连夜坐车赶到医院,可是医生告诉我,患者70多岁的母亲不同意角膜捐献,她说如果捐献了,就看不到回家的路了。言下之意就是,他们连角膜捐献都不同意,更何况是器官捐献。可是我还是想尝试着努力一下。我穿过监护室长长的走

廊,来到家属休息室。我很忐忑地推开那扇门,看到里面坐着20几位患者家属。我来到他妻子的身边,告诉她我是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希望可以和她单独谈谈。她显然知道我为何而来,她说:不用了,我们不会同意,我妈妈也不会同意的。

1%,这是我当初给自己定的目标,希望动员100个患者家庭会有1个家庭同意捐献。显然,当时的我根本没有预计到这个数字对于我的挑战到底有多大。当我一次次地面对拒绝、不信任、不理解,甚至是语言上的威胁,我发现最难的不是身体的疲劳,而是心理上如何在一次次被拒绝中坚定前行。

成为一名协调员,和护士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我们面对的始终是失去亲人的家属,目睹他们失去亲人的绝望,感受他们在选择器官捐献时的挣扎。去年9月,有一位姓沈的男性患者,因为车祸重型颅脑外伤已经无法挽救了,我和医生一起跟他的父亲沟通。医生告诉你,你的儿子已经救不回来了,但是可以考虑器官捐献,将他的部分器官留在这个世界上。

没等我们说完,他的父亲站起来说:“我们不考虑”。我再次见到他的父亲是10天以后了,他对我说:“小曹,我第一次听到医生跟我说器官捐献的时候,我真的很反感,我们还要抢救的呀!”在沟通中,我才知道,沈先生的父亲是位老师,他一共有3个儿子,沈先生是父亲眼里最能干的一个,却在去上班的路上出了车祸。

我转头看向沈先生的妻子,问她是怎么想的?她说她刚听到器官捐献的时候,真的接受不了,她说我们已经这么可怜了,为什么还让我们捐献?我没有说话。她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可是事情总有两面性的,如果我们把器官捐献出去,就可以救救其他的家庭。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受到了震撼。很多人都会说去救救别的病人,她却说去救救别的家庭。我想他们最知道一个人的离去,带给整个家庭的是怎样的悲痛与绝望。最后,沈先生捐献了



协调员向器官捐献者家属讲解捐献流程。



缅怀人体器官捐献者。

心脏、肝脏、两个肾脏和两只角膜,帮助了6个家庭。

5年的时间里,我记不清自己到底见证了多少次的生死别离,多少次在节假日、甚至是下着大雪的夜晚奔波在路上,多少次走进监护室、走进殡仪馆。曾经觉得自己感受了太多的

悲伤,这份工作无法再坚持下去。

有人问我:为什么还在坚持?记得,有一位50多岁的捐献者,因为脑血管意外离世,家人帮他作出了身故后器官捐献的决定。那一次的捐献与移植在同一家医院进行,当医生还在为捐献者缝合伤口的时候,从另一个

吗?”“他能理解吗?”我陷入了矛盾。果然,先生在得知我可能再次捐献的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是担心我的身体。而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得知我们的状况后,并没有急于劝说,而是积极为我们联系北京、上海等地的权威专家,多次和我的家人特别是我先生沟通,解释他的各种疑问和顾虑。最终,先生帮助我一起下定了决心,他说,“既然帮人就要帮到底,咱们不能见死不救!”所以,今天我也要借此机会,向我的先生说一句感谢,感谢你的理解和支持!

接下来的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2013年4月9号,我再次赴京住进了熟悉的空军总医院捐献病房。我捐出的94毫升淋巴细胞,再度跨越千山万水,为韩国患者送去祝福。我也因此成为浙江省首位女性二次捐献和首位跨国二次捐献志愿者。

虽然我们的婚礼因为捐献推迟了,但经历了这次的考验,我和先生的感情更加牢固。更让我惊喜的是,他居然选择在婚礼举行的前一天也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和我一样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按照先生的话说,“既然是夫妻,没有理由不在一起!更何况那是一项拯救生命的伟大事业呢”!

最后,我给大家报告一件喜事,我们的小家伙去年11月底出生,因为在肚子里的时候特别闹腾,我们给他取了个小名叫“哪吒”。省残联和红十字会的领导、工作人员在我结婚、生孩子的时候都来看望我,非常感谢他们。今天,我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捐献造血干细胞无损健康!它在造福他人的同时,也幸福着我们自己!

一直对我们说:“谢谢!谢谢!”

很多人都说,捐献者和他们的家人伟大、高尚、大爱,可是在我的眼里他们普普通通、有血有肉,有温情、有遗憾、有不舍、有无助、有绝望,更有坚忍。去年的5月份,江西上饶一名小伙子在浙江不幸遭遇车祸即将离世,父母在慎重考虑后,决定在孩子离世后捐献可用的器官,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他的爸爸说:“如果今天是我的孩子需要接受移植,我也会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可是回到老家后,村里的人都无法理解他们的决定,觉得他们太狠心,甚至猜测他们是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才这么做的。失去孩子的悲痛和流言蜚语的伤害,让他们都快崩溃了。我们问他的爸爸:后不后悔当初的决定?他说,不后悔,相信好人会有好报的。我们又问他:什么样才是好报?他说儿子出殡那天,天气很好,给儿子刻墓碑的人很帮忙。那一次,我遇见了宽容。

从事这份工作,收获最多的,是来自捐献者家庭的感谢。也许是因为我们在他们最悲伤无助的时候站在他们的身边,也许是因为我们帮助他们实现了助人的心愿,也许是他们体会到了我们真诚、用心的交流。协调员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前不久,一位捐献者的女儿给我同事打来电话:“哥哥,我考上大学了,但是妈妈希望我去读职业学校,这样可以少花点钱”。同事对她说:“没事,哥哥最近股票涨了,哥哥帮你”。

今年清明节,一位协调员同事带着女儿去捐献者纪念碑献花,她给女儿讲刻在纪念碑上那些人的故事。

还有协调员专门开了一家爱心网店,利润全部用来资助器官捐献者困难家庭的孩子。

每一位选择走上器官捐献协调员岗位的人,都有过与我相似的心路历程。从满怀爱心,到曾经犹豫不前,最终在一次次生命的迎来送往中,明白了协调员岗位的真正意义——每一位捐献者都是天使,而我们就是守护这些天使进入天堂的人”。